解读"日本禅"

杨薇

内容提要: 禅是日本文化的支柱,武士道的核心即来自于禅,它不仅构筑了日本人的人生哲学,而且影响着日本艺术美的基调。禅宗与神道相融合,形成"日本禅",它使日本文化朝着"苦涩""枯淡"的方向发展,并直接促成"物哀"、"空寂""闲寂"日本文艺三大美理念的形成。把握"日本禅",是深入破解日本文化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 日本禅 人生哲学 文艺美理念

禅宗的发源地在中国,从它诞生之日起,日本僧侣又开始新的"移植"。12世纪荣西将临济禅,13世纪道元将曹洞禅带入日本,禅宗东渐,很快受到日本武士阶层的垂青。禅宗乃印度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变高度缜密的、严密的逻辑推理的佛陀教义为非逻辑,靠主观直觉来把握之物。"中国化"了的禅宗具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见性成佛""直指本心"等简单易行的特点,非常适合来去匆匆的武士阶层的胃口;特别是禅宗强调苦心静修的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及"生死一如""寂死为乐""生命轮回"的思想,有利于培养武士钢铁般的意志,并给予驰骋疆场的武士以勇气与理念支持;此外,禅宗崇尚直觉思维重佛教实践,强调"坐禅""作务",即以劳动为最佳修炼方式,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更重直觉与实践,这是禅宗之所以能"长驱直入"于日本文化之中的深层原因。查尔斯、艾略特在其名著《日本佛教》中也持此见,他说:"禅对于东方的艺术、知识及政治生活来说,具有伟大的力量,禅也是日本式性格的表现,其他所有佛教都没有禅那样'日本式'"(1)。

武士道文化的核心即来自于禅,它不仅构筑了日本人的人生哲学,而且也影响着日本艺术美的基调。禅宗与神道相融合形成"日本禅",它使日本文化朝着苦涩、枯淡的方向发展,并直接促成了"物哀"、"空寂""闲寂"日本文艺三大美理念的形成。"日本禅"早已走出了中国的"寺院禅房",被民众化、社会化,并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不同于中国的东方独树一帜的禅文化体系。

一、禅构筑了日本人"生的哲学"

1、禅宗"作务"思想

禅宗强调"作务",即砍柴、烧水、打扫、园林、种田等等劳动实践,中国的百丈怀海禅师就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日本自古即有着勤勤恳恳、专心致志于农业生产的"精农主义"(2)性格,17世纪日本禅僧铃木正三又将其发扬光大,他以"众生为佛"为理论的出发点,将现世职业视为"佛行",认为勤业、敬业、乐业即是修行"善根",并将商业也视为"无漏之善根",比如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商人经商,武士卫国均是在修行佛行,即实现一种人生价值,而不劳动则意味着停止佛行,因此闲赋在家、游手好闲之人一向是被日本社会所唾弃和排斥的,从而树立起一种促进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全新的宗教伦理,即"劳动为美"的道德理性原则,至今工作狂般的生活方式依然是被日本社会所普遍认同的生命价值与人生追求。

2、禅宗"清贫主义"的生活方式

禅宗崇尚疏食蔽衣,粗茶淡饭,这与武士倡导的廉俭操守相一致,因此为武士所推崇。对于武士而言,对饮食说长论短是有伤大雅,缺乏教养的表现,大丈夫应远离厨房,饮食讲究七分饱,不奢华,尚节俭。铃木正三之后石田梅岩认为,浪费与奢侈会破坏社会秩序,而提出"俭约"乃政治之大本的主张,江户幕府力倡节俭。在日本,浪费乃极大的犯罪,上至天皇下至民众,均以"节俭为美",天皇长子玩具用过,次子用,坏了再去修理。"节俭"与"勤业"同样成为日本社会所普遍认同的道德理性原则,"勤俭"成为日本人美德评价的重要标准。

3、"言简意赅"

禅宗崇尚简洁的思维方式还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语言世界,武士以寡言多行为美,即多做事,少言语,甚至"无言语"。对武士而言,多言多语则有失武士威严之气,因此一句话能说半句不说一句,能说一句不说两句,讲求语言凝练,言简意丰,只言片语却让人回味无穷,即所谓"沉默是金",并教育男孩子不要多说话,无论遇到什麽都要默默地忍耐,认为这是男子的美德,即以"沉默为美"。

4、禅宗"悲世"情怀

自然资源贫乏,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的日本列岛,往往会在弹指之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幻化为无有,因此特定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对"人生即苦""人生无常"的佛教、禅宗情有独钟,产生强烈的共鸣,因此武士亲禅,日本人亲禅。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巨大的生存危机感使日本人总是以挑战人生极限的姿态工作着,沉重,压抑,因此日本人身上少有狂喜的表情,被称为"富而不乐"的人;而有着深厚儒道文化积淀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则比较"乐世",既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积极入世的儒家理性,亦有退而隐逸的

的道家哲学。关于此,周一良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日本文化有一种苦涩枯淡之味,即"禅味"。查尔斯. 艾略特在《日本佛教》中也指出,日本的性格就是禅(3),而本文第二、三部分笔者所要展开论述的日本人的"死亡哲学",以及日本文学艺术艺道则正是日本人"悲世"心理的折射。

二、禅也支配着日本人"死的哲学"

1、禅宗的生死观

禅宗认为,"生死一如""寂死为乐""生死轮回",此给予驰骋疆场的武士以理念上的支持,使其在战场上能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这种生即死,死即生,死乃生命之"轮回",死乃"重生"的禅宗生死观为武士社会所推崇,武士修身书《叶隐闻书》中的名句即曰:武士道即通向死亡之道,武士的哲学就是死亡的哲学。

2、禅理念支持下的"剖腹"

剖腹始于永祚元年(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 出内脏扔向军官,据说此乃剖腹最早来源。镰仓时代盛行引咎剖腹(因丢失阵地)或阵前剖 腹(因耻于被擒),江户时代以后社会稳定,殉死、殉情(男女情死)之风盛行,虽幕府颁 布禁令而不绝。

剖腹分"坐腹"和"立腹"两种,方法有一字形、二字形、三字形及十字形四种。被视为最霸气逼人的乃"十字形腹",日俄战争中被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在明治天皇驾崩时,剖腹自尽即十字形腹。

3、武士文化影响下的"高自杀率"

武士道"轻生死",日本许多著名文学家选择自杀,如有岛五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小说结尾处都是唯美死,在他看来死乃重获新生,并最终选择吸煤气管自杀;三岛由纪夫幼年时一直受天皇思想教育,看到天皇思想不能复活而痛苦,终于1970年在给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部内演讲后当众剖腹自尽。

当今日本社会每当发生政治的、社会的丑闻和渎职事件时,必有人自杀。2002年5月12日在日本北海道发现了日本国内第四例输入性疯牛病后,北海道29岁的女兽医逐在家中引咎自杀。1998年日本企业经理自杀者达713人之多。2007年11月东方早报报道,日本自杀人数连续九年超过3万人,日本自杀率在发达国家里是较高的,日本上网普及率极高,近年网上相约自杀者不计其数。

日本著名画家古贺春江说,再没有比死亡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也有人说,在赴死

之际,能体验到一种人格升华的慷慨凄凉的满足。由此可见,禅亦主宰着日本人死的哲学。 4、不同文化下的生死观

西方如美国经济同样不景气,但其自杀率仅日本的一半。基督教认为自杀是罪恶,13世纪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在《神学大全》中罗列了自杀是犯罪行为的三大理由,欧洲各国的法律均以此为依据,欧洲中世纪法律严禁自杀,英国直至1961年才废除自杀罪;而日本却有一种赞美剖腹和殉情的传统。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着不同的生死观。所以虽日本政府制定各种防止自杀的措施,但都是治标不治本,武士道的"生死观"是造就自杀者的"温床"。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先生尖锐地指出:"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来自于禅"(4),它占据着日本文化的核心位置,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进入武士社会,武士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言行举止被社会普遍推崇,上至宫廷,下至百姓均以此为楷模,竟起效尤,从而形成武士道民众化、社会化的倾向,日本民族的均质性即由此而来。近代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哪怕是一个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5)。客观地说,武士道就其本身而言,是关于武士的道德与行为规范,但当它被日本统治者邪恶利用时,则变成杀人机器的代名词了,这一点我们要辨别清。

三、禅还是日本文学、艺术、艺道的内在支撑

(一) 禅与日本文学

"物哀美"文学 禅对于日本许多体裁的文学形式均有影响,首先它直接促成了日本文学核心美理念——"物哀美"的形成。"物哀美"是日本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简言之就是一种悲情美意识,它是一种纯粹感觉式的美,不是凭理性、理智来判断,而是靠直觉、靠心去捕捉到的美,其间有股惆怅的味道。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认为"物哀"的最高成就就是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他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中指出,其所述均为世间真人真事,看了不由你不动心。据一位日本学者统计,《源氏物语》中出现的"哀"字多达 1044 个,其半数乃至三分之二是与同情相通的,表达作者对人生百态的哀愁和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有评论认为作者对"哀"作出了出色的表现,将哀从初级阶段推向高级阶段,从"哀"的事物升华为让人知道的"物之哀"。

这种"物哀美"文学美理念的产生,首先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关,日本列岛一方面山清水秀,景色怡人,另一方面自然资源贫乏,火山地震频生,它会使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消亡,从而酿就了日本民族易动、易感、易哀的情感,因此"悲世"的佛

教("人生即苦""人生无常")、禅宗与日本人的思想感情正相契合,迅速为日本人所接受; 其次,日本一代文学宗师紫式部出身书香门第,自身有着极高的汉文学素养,也信仰佛教, 很早丈夫去世与幼女孤寂为生,特别是她亲眼目睹宫廷权利争斗及女性悲苦命运,不断发出 "人生悲哀"的慨叹,并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力将其"禅化",升华至"艺术化"的审美境地, 从而形成"物哀美"的日本文学独特的审美意识,所谓"物哀"即对人生不如意的悲哀。特 殊的文化风土使得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尚悲不尚喜",悲生而亲死。

由是观之,"物哀美"的理念一方面受到佛教"悲世"理念的侵染,同时也在禅的了悟之中得以升华与发展,这种悲剧美意识于平安时代之后,一直成为日本文学评价的重要标准,也成为日本一代代文学家竞相追逐的表现形式。

俳句 禅之于日本文学的影响明显见诸于日本独特诗体——俳句,它是日本诗歌的代表形式之一,只有十七个音节,虽短小,但却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俳句直接受到禅的影响,日本著名诗人与谢芜村认为,在创作俳句时要根据刹那间的"悟"进行,诗要一气呵成,而这样的技艺只有禅学思想深厚的人才能掌握。铃木大拙认为,禅不靠任何理性或概念的东西,而只靠直觉去体悟生命及佛理,这种直觉在俳句创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诗人的直觉观照突然迸发出不可遏制的灵感而进入迷狂状态时,就会创造出独具"幽玄"或"妙"的伟大作品,这种"幽玄"或"妙"就相当于中国文学理念中的"神韵"或"气韵"(6)。

中国文人禅诗有的写得十分精致,而俳句不同于此,俳句要的是禅之机趣,如江户时代诗人松尾芭蕉创作的三行诗"古池塘,蛙儿轻跳入,水声响",它用极其浅近的语言,传递不可言传的禅意:陈腐得近乎凝固了的古池塘,由于青蛙这一鲜活的生命,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惊醒处于迷茫中的人们。又如与谢芜村的"青青铜钟上,蝴蝶悠然眠",则暗示一种不与世相争的超凡脱俗的气质,达到超脱逍遥的境界。日本俳句源自于中国的禅诗,但又有所创新,它以孤寂的心静观大千世界,语言平淡自如,朴实无华,却发人深省,达到"闲寂"的艺术效果。

(二) 禅与水墨画

在日本传统绘画中,水墨画受禅宗影响最为深刻。水墨画是一种素描,通过一根根墨线的浓淡和粗细来表现立体感与透视感,并同时表现时间感与空间感的不同,是一种技艺高超的绘画。

乔治. 达斯维特在《中国的神秘思想与近代绘画》中对禅与东方传统绘画的关系进行了 很好的揭示。他说,中国美术家绘画的关键,就是思索集中,且随意志的去势一气呵成,在 作画前,首先要将所绘之物作为一个整体去观察,思散神驰就会成为事物表象的奴隶。即将丰富的"物象"高度"禅化"、艺术化。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也曾一语道破天机,他说,禅启迪了日本人的艺术冲动,似乎有什麽东西与魔法相通(7)。在此基础上,依靠简洁而有限制的墨线来表达深奥的境界,颇似象征性绘画,具有强烈撼力,禅特别强调"悟"体验,悟就是"迷狂"、变态,就是一种超越(8)。

与中国水墨画相比,日本水墨画更多地大量使用"余白"与简笔体,即在画纸或绢本上尽量用较少线条和墨块,用最简练、浑朴的笔法去描绘物象,这体现了禅的精神。在禅宗看来,一既是完美,又有普遍性,因此日本艺术崇尚"一",一枝花 ,一棵树,一个人,铃木大拙将其归纳为"一在万之中,万在一之中",因此画面极其简洁,意境甚至有些感伤,而不像西方油画将物象充满整个画面,与西方绘画、雕刻、建筑那优美、宏壮的对称性相比,日本艺术显得有些朴素、简陋,甚至残缺不全,但日本艺术家却坚信这种风格最能表达自我,而十分满足地陶醉于其中(9)。

日本水墨画源自中国,但又有其创新与发展,融贯了"空寂"的艺术精神,追求一种恬淡的美,也有人认为,日本水墨画也涵概了"闲寂"的艺术精神,表现出一种未经雕琢的质朴的美,它不精致,也不鲜艳,还有些苦涩、枯淡,这正体现了日本禅的精神。

(三) 禅与能乐

能乐是日本最严格的古典艺术,发展至今已有 600 年历史,它是在吸收中国民间曲艺和 唐散乐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表演、对白艺术,13 世纪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在前人 基础上创立了以歌舞为主体,戴着面具诉说喜怒哀乐的能乐。能乐由能乐师、能舞台、能面 及伴奏师、能装束、剧本构成。能乐师是能乐的主宰,均为男性;能面多由桧木雕刻而成, 其独到之处在于兼有"悲哀与微笑两种截然相反的表情",兼具"悲喜"的能面扩大了能乐 师的表演空间。

禅是能乐表演的灵魂。能乐表演时,要求演员进入"禅定"状态,达到"无相"的自由奔放的艺术境界;无论演什麽戏,能舞台背景都是一棵青松,能乐追求虚无的世界,将舞台化"无",即无表情(能乐师戴上能面具)、无布景、无道具,让观赏者从无形的表情和无形的空间背后,去想象其无限大的空间和喜怒哀乐,以缓慢乃至静止的动作去体味它的充实,加上谣曲的单调伴奏,造成一种"寂"的气氛,使能剧表演达到幽玄的"无"的美学境界(10),即苦涩、枯淡之境;此外,世阿弥还强调能剧表演要"心七分动",即表演动作只表现"心"的七分,不要把心全部表露出来,这样才能使人有回味的余地,犹如日本水墨画的"余白",留给观赏者一个自由想象的空间,任其思想自由地"填充",能乐大师世阿弥指出,"观赏能

艺之事,内行者用心来观赏,外行者用眼来观赏,用心来观赏就是体也(《至花道》)"。日本艺术崇尚简洁、含蓄,这正是"日本禅"的表现形式。

有评论者认为,能乐与歌舞伎表达悲哀的方式有别于中国和欧洲,中国与欧洲的戏剧往往以悲痛欲绝的"放大"动作来表现其巨大的悲哀;日本则是采用静寂地忍受悲哀的动作,让观众自己去感受表演者强烈抑制的悲哀,用心去体验这种悲哀美与静寂美,达到"空寂"美的艺术效果。铃木大拙先生也曾指出,"感情达到最高潮时,人就会默不作声,多少受禅的方法影响的日本艺术家们,产生了用最少的语言的倾向,暗示力是日本艺术的秘诀"(11)。

在日本文学艺术领域,"物哀""空寂""闲寂"构成日本文艺三大美理念,它占据着日本艺术的核心位置,是"日本禅"的艺术外化,也是日本艺术的精华与极致,"空寂"与"闲寂"由"物哀"发展而来,这两者的艺术精神是相通的,主要是表达一种以悲哀和静寂为潜流的苦涩美、枯淡美与朴素美,均属于主观感受与体验,是独具日本特色的美理念。

(四) 禅与茶道

中国乃茶道的发源地,唐代陆羽的《茶经》乃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据学者们最新研究,中国茶道创立于唐朝,并且儒释道并融,南宋时期日本引进中国的茶道,但逐渐摒弃了中国茶道养生长寿的一面,逐渐发展为修炼禅意的功课,培养高尚情操的一种契机与方法,且规矩要比中国茶道繁复得多,到了近代,中国饮茶注意茶道的越来越少,日本茶道却始终如一地保存着禅的精神并传承至今,离开了禅意,也就无所谓日本式茶道。

因此茶道是禅的一种修行方式,是禅的"延续",即所谓"禅茶一味"。茶道核心在于"悟禅",即修炼禅意,使意念清净,淡泊功利,返璞归真,实现自我,心灵的"纯化"在茶道这一艺术中得以完成,这才是茶道的真谛。

禅宗对于茶道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茶道仪式中对禅宗精神的奉行,千利休将茶道精神概括为:和、清、敬、寂。"和"即和谐,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清"是茶道环境清洁、整齐,要求茶室一尘不染,在茶庭之上营造清净无垢的佛陀世界,建立人间的"净土";"敬"指人与人彼此尊重、互敬,无任何的等级与偏见,即所谓"其交淡泊无阿谀奉承之事","亦无傲慢无理之举"(12);"寂"即贫困,静寂,千利休主张"少私寡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达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空云卷云舒"之极其高远的道家人生境界,安于贫困,不为外物所动,即所谓"脱俗",此乃茶道的根本。

学者们认为,至千利休茶道达到了一种"空寂"的艺术境界,明确"空寂"为茶道的美理念。"空寂茶"强调去掉一切人为装饰,追求自然、简素的情趣,枯淡的意境,通过茶道,净化心灵,达到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与此同时,茶道非常重视茶人之品,主张谦卑内敛的

为人之道。因此可以说,茶道是一种融宗教、道德、哲学、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是禅宗日本化的典范,是"日本禅"的创新与发展。日本一方面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钟爱传统,茶道在日本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至今休习茶道的人也有 400、500 百万人之多,成为日本人所珍爱的传统艺术。

(五) 禅与花道

日本花道流传至今已有 550 年的历史,几经演变,形成许多流派,有"世俗三千流" 之说。当代日本花道舞台由三个著名流派所占有:池坊流、小原流和草月流,池坊流是日本 花道的创立者,也是日本花道中最大的一个流派,弟子超过百万。据说,在日本学过插花的 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插花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成为女性修养 的一项重要内容。

禅宗的重要特性为亲近自然,于自然之中"悟道",自然与禅互为表里,相互辉映;而日本人自古即有着一种"自然情结",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曾说"日本人与石、树木和花草心灵相通,日本人对自然怀有独特的浓厚情愫"(13),这使日本人从文化心理上亲近禅宗,而花道之真谛即在于采用人工技艺,将自然的纯朴之美展现出来,通过花道形式表达人们对大自然,对人生的感悟,以及万物流转的体验。

建立在禅宗"无常观"基础上的插花艺术十分注意"动感因素",根据时间的发展和季节的变化而选择相应的花材。如枯枝反映过去,蓓蕾表示未来,枝条有力的曲线象征春天,凋零的枯枝则寓示冬天;传统花道反对左右对称并使用单数花材,这样插出来的花才是"生花",即有生命力的花,而双双对对平衡插入的花则被视为"死花",因为太完美。可以说花道中处处有禅(14)。

花道之中蕴含哲学。日本传统花道由象征天、地、人的三条枝干组成,其中高者为天,低者为地,中间为人。天是主线,是整个造型的基础,冲向天空,表示对天的崇敬(15), 三条枝干"三才一致",和谐统一,花道所传达的正是对大千世界的种种"悟"与体验。

日本传统花道不象中国、西洋插花那样满满当当,造型繁复,五彩缤纷,而是以"一枝枯枝,一朵白花,一坛清水便勾勒了冬日的凄美"(16)。即所谓一条枝杆,一朵花,更能表现天地宇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曾说过,"一朵花比百朵花更能反映花的魅力",充分体现了禅宗"一即多,多即一"的思想。所以日本传统花道简洁、宁静、轻巧、质朴,于静寂、恬淡之中透出浓浓的"禅味",它不象中国、西洋插花那样喜气洋洋的,而是显露出苦涩、枯淡的意境,这与高度禅化了的日本文化的总体气质是相契合的。

(六) 禅与日本建筑园林

日本建筑有着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简单、纯粹风格的追求,最为典型的则是位于三重县的伊势神宫,它贯彻了神道文化的本土精神,各部均毫无人工装饰与人工技巧,是一种"至简至纯"的美,且位于山中林间,依山傍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日本神道教以"自然为本位",禅宗则崇尚自然,两者正相契合,走向融合。

禅宗传入后,日本人对宋代禅宗五山十刹的建筑风格极为推崇,对中国园林的"缩景艺术"更为欣赏,于是在日本大规模复制,室町时代数以千计的禅寺均仿宋代样式被建造出来,称为"禅宗样"。但日本园林并未止于仿制,而是根据本土文化的需要,有所创新,其中最独具创意的乃是枯山水缩景艺术。

一般来说,"无池无水不成园",而日本的枯山水却排斥水与池,以石、白沙、苔藓为素材,故亦称假山假水。它是在禅宗冥想的的精神世界里构筑出来的"净土",14世纪室町时代,小规模的枯山水庭园广为流行,最具代表性的乃京都龙安寺石庭,呈长方形,占地150余平方米,庭内无一树一草,零星错落地安置了15块大小不一的石快,并铺以白沙、苔藓,供人睹物静思,冥想天外:使观者仿佛置身一望无际的大海,海中分布着星星点点的岛屿,岛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此乃枯山水的精妙所在,使人由建筑的小空间进入自然的大空间,由有限进入无限,体现出一种淡泊、玄远、寂灭、往生的宗教情怀(17)。这种抽象化的枯山水给人一种干枯、寂静的感觉,进而引申出"空寂""闲寂"的审美情趣,体验到自然、朴素、枯淡之美。

茶庭是源于茶道的一种园林形式,它是在禅宗理念影响下营造出来的独具日本特色的空间艺术形式。它不是供游人赏景、游戏的场所,而是严格的宗教修行的道场。茶庭一般只种常绿植物,不栽花,选用树木一般为赤松、黑松、杉、柏、石楠、樟、竹、枫等常绿树木;以拙朴的步石铺设小路,迂回曲折,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以营造和、寂、清、幽的禅宗意境,达到"空寂"美的艺术效果。如今有着500多年历史的茶庭成为当今日本庭园的代表,其庄严肃穆的氛围足以荡涤人的心灵尘埃,并抚慰现代人骚动不安的心灵。日本古典园林源自中国又自成一家,"中国古典园林的主体是文人园林,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而日本古典园林的主体是武士与僧人园林,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8)。

此外,禅对日本柔道、剑道亦有深刻影响,日本武道独尊禅家,中国武术则儒释道并融。限于篇幅,这里则不做详论。

禅成为日本文化的支柱,它不仅构筑了日本人的生存哲学,还与日本文学、艺术、艺道相通,极大启迪、激发了日本人的艺术创作。乔治. 先森在其所著《日本文化简史》中高度

概括了禅对日本文化的意义,他说:"禅宗对日本的影响极为微妙而广泛,所以它成为日本文化精髓的极致。它如此深入于日本人的思想、情操、美术、文学和习惯之中,以致于使许多人为了写日本精神史上这一最难而又最有魅力的一章不辞辛劳(19)。禅宗经过"日本化"改造与创新形成"日本禅",而把握"日本禅"则是深入破解日本文化的关键。

注释:

- (1) 转引自铃木大拙:《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筑摩书房 1965 年,第 262 页。
- (2) (日)松尾康二:《日本深层文化与中日文化交流在 21 世纪的作用》,《日本研究》 1998年 2期,第 73页。
- (3) 转引自铃木大拙:《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筑摩书房 1965 年,第 262 页。
- (4)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三联书店 1989年,第4页。
- (5)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岩波书店 1969年,第32页。
- (6)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三联书店 1989年,第4页。
- (7)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三联书店 1989 年第 26—27 页
- (8)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三联书店 1989年,第159页。
- (9)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三联书店 1989年,第4页。
- (10) 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90—91 页。
- (11) 转引自佛智慧论坛: bbs.fozhihui.com。
- (12) 金丹元:《禅意与化境》),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第 121页。
- (13)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27 页。
- (14) 徐蓁: 经理世界网 ceocio.com.cn。
- (15) 徐蓁: 经理世界网 ceocio.com.cn。
- (16) 徐蓁: 经理世界网 ceocio.com.cn。
- (17) 刘婉华:"文心与禅心——中日古典园林审美意境之比较",《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2004年第6期。
- (18) 同上(17)。
- (19) 转引自铃木大拙:《现代日本思想大系》, 筑摩书房 1965 年, 第 262 页。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徐静波)